

组织与创业领域

——组态视角下的创业研究^{*}

□ 杜运周

摘 要：本文评论了 Aldrich（2019）的论文。我们认同创业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实践，更多地开展现象驱动的研究。同时本文引入组态视角，提出将组织演化理论和个体主动性理论结合，开展人、组织和环境匹配研究的思路，本文还梳理了理想类型在制度理论和战略类型中的运用，进一步延伸提出组态视角应用到新企业战略和创业导向、商业模式、创新和资源拼凑等创业研究领域的思路，并提出了 QCA 方法运用于组态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组态；QCA；创业；组织演化；现象驱动；个体主动性

Aldrich 教授在组织与创业领域贡献卓越，他的研究涉及创业团队形成、演化理论、创业中的性别不平等多个方向。Aldrich 教授曾被授予 2000 年国际管理学会组织与管理分部（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OMT）杰出学术成就奖。同时，他的著作《组织演化理论》（*Enterprise Evolutionary Theory*），获得了国际管理学会“乔治·特里著作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的“马克斯·韦伯著作奖”。Aldrich 一生最自豪的就是自己在组织演化理论中所做出的贡献。

Aldrich 教授是动态追踪和现象研究的倡导者。在研究生涯的早期，他对英国的少数族裔企业继承进行了多轮比较研究。同时他也是最早关注组织与环境关系的学者之一，其博士论文题目《敌意环境下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正是立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Aldrich 教授开始关注创客空间这一新现象的研究。在 Aldrich《对我研究生涯和组织与创业领域作品的反思》（2019）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一生学术成长的历程，并谦称其创业研究的学术成就是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自恋人格、多层次制度逻辑与众创空间内创业者战略选择及效果研究”（71672033）资助。

但在访问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跟随Aldrich教授学习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他的学术成就更多的应是一个卓越的学者长期用心和保持对现象和理论敏感性的必然结果。

Aldrich发展的组织演化理论，提出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决定了结果。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创业者和组织需要创造新的战略、程序、结构要素和能力，并从中选择行之有效的要素，复制或者延伸这些要素。组织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包括：变异（variation）、选择（selection）、保留（retention）和斗争（struggle）。组织演化理论强调选择的驱动力源于行动结果（consequence of action），而非行为者的意图（intentions of actors）。即行为者可以预测环境、重塑环境、创造选择项，但最终由行为结果来选择最主要的因素。Aldrich也指出了创客运动这一新创业现象的研究价值。我们赞赏组织演化理论对创业现象的解释力，也认同现象研究和创客空间研究的价值。但是Aldrich环境选择视角聚焦于权变和反应性的解释，对于组态视角（Wiklund & Shepherd, 2005）和个体主动性（Frese, 2005）的关注有所欠缺。本文引入组态视角（configurational approach），进一步讨论了组态视角在整合个体、组织和环境互动、商业模式、创业拼凑等创业研究上的价值，以及QCA方法在创业研究中的可能应用。

一、组织演化理论与创业研究

Aldrich（2006）的组织演化理论对创业研究有四个主要启发：第一，指出了创业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迭代过程。人创造组织，而组织是嵌入特定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从这个角度

出发，创业研究就需要深入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文化，以及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适合这种文化。因此在创业研究中，引入时间和空间，开展历史研究和特定空间的选择机制，对于解释创业企业的演化、生存和组织形式的选择就很有价值。第二，创业是新兴行业的重要来源。创业是组织演化过程中变异的重要来源，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挑战，当创业开辟新的领域时，新的行业就诞生了（Aldrich & Fiol, 1994）。从组织演化理论出发，可以分析什么样的创业者或团队、在什么情境下、何时更可能选择开创新的行业，而非在既有行业中选择既有组织形式进行创业。创业企业又如何克服进入新行业的障碍。第三，高创业活跃度可以为组织、行业和区域带来高的变异。未来可以研究怎样的营商环境下，区域、行业或者组织的创业活跃度更高，进而促进变异的发生。环境选择的压力越大，组织是否越需要创业和演化产生新变异，来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四，弱小的创业企业面对强烈的选择压力容易死亡。创业企业既面临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 1965），又面临小企业缺陷（liability of smallness）（Aldrich & Auster, 1986）这种情况下，很多创业变异在强大的选择压力下消亡了。根据组织演化理论，为什么有些创业企业的变异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

二、组态视角：整合个体 主动性、组织与环境 解释创业现象

组织演化理论和个体主动性（Personal Ini-

tiative, PI) 两种理论在解释创业机制上的出发点和立场迥异,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整合的机会和空间。组织演化理论强调环境选择的力量,认为是组织与环境的适配决定了组织结果,而非组织或环境可以单独决定结果 (Aldrich, 2011)。如果我们认为环境的动荡、复杂、模糊和不确定是常态,组织与环境如何动态适配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组织应该坚持什么、改变什么来实现与环境的动态适配?是行动速度更快(快战略)还是坚持专注、发展核心能力(慢战略)?组织演化理论强调行为结果而非行动者意图驱动了选择。Aldrich (2008) 甚至认为,组织理论学者不应过早进入个体分析。个体面临环境难道只能被动响应,接受被选择的结果吗?

个体主动性理论则突出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在影响组织结果中的作用。个体主动性是一种行为视角 (behavioral approach), 强调积极主动行为对绩效的价值,行为视角被认为是比特质视角 (trait approach) ——强调什么特质的人更适合创业——对创业研究更有价值 (Gartner, 1988)。其核心观点是,人们经常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当人们超越他们被告知要做的东西时,他们的绩效会更好 (Frese, 2005)。个体主动性包括三个方面:自发性 (self-starting)、前瞻性 (proactive) 和坚持 (persistent)。高自发性者具有三个特点: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做某事;追求自我设定的目标;偏离“正常”或阳关大道路径。前瞻性的典型特点是:长期关注机会和问题;超前行动即不会等到必须对某项要求做出反应时才去做。坚持是达到目标所必须的,因为环境在变化,总有持续不断的新

困难出现。从长远来看,高个体主动性是对组织的生存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但是短期导向的企业可能会忽略个体主动性的价值。个体特质(成就动机、行动动机、前瞻特质等)、知识、能力以及环境支持,通过影响个体导向(如自我效能、责任偏好、变革导向、试错等),进而影响到个体主动性行为 (Frese, 2005)。因此高个体主动性与创业导向和组织成长的可能关系值得研究。在创业导向研究中强调创业企业的先动性、风险承担和创新性有助于把握新的机会,促进新企业成长。高个体主动性创业者可能会促进创业导向。但是个体主动性视角却没有回答:创业者在环境选择的压力下,如何既维持高的个体主动性又实现个体、组织与环境的适配?

组织演化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因素适配对创业结果的影响,而个体主动性则提出个体在创业中的重要能动性。比较组织演化理论和个体主动性可以发现两者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它们的结合则更加完整。采用组态的视角,整合个体主动性与组织演化理论,可以系统分析个体、组织和环境的协同如何共同决定创业结果,以及个体、组织和环境要素有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限制创业企业实现预期结果。这种结合还可以延伸到战略选择理论,其强调了在动态政治过程中,高层领导或高层团队这一小群体具有权力 (power),可以能动地影响组织决策 (Child, 1972)。

三、理论驱动与现象驱动 结合的创业研究

Aldrich 作为组织演化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在文章中特别建议青年学者要深入实践,了解

创业现象。作为一位拥有社会学背景的创业学者，Aldrich 在学术生涯中长期坚持深入实践，博士期间就去欧洲实地了解当地情况。近年来他痴迷于新兴的创客现象，经常深入创客空间观察。无独有偶，个体主动性理论的提出者 Frese 教授（2005）总结其学术创业的经验，也建议立志于开发理论的学者，要结合理论与实践，并提出整合定性与定量方法开展管理问题研究。最近几年，管理学领域对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质疑声日益强烈，2018 年 Graebner 等学者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组织了一个针对现象研究的特刊，强调不要从现有理论出发推导假设，鼓励投稿者直接研究现象发展洞见和理论。2019 年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第 3 期，两位副主编 Ployhart 和 Bartunek 撰写主编评论文章题为《没有什么比良好的实践更理论化：呼吁现象的理论》（*There Is Nothing So Theoretical As Good Practice—A Call for Phenomenal Theory*）。两位副主编对 Lewin（1951）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践”，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是时候反过来，重视现象了。Ployhart 和 Bartunek（2019）指出大多数 AMR 发表的文章并没有被实践引用和产生影响，甚至可能起到破坏好实践的作用；并建议学术圈不应想当然地认为理论可以给实践带来恩赐，而是要意识到没有实践者，学术圈可能无事可做。

Hambrick（2007）也曾明确指出管理学过于强调理论驱动，导致“现实必须等待理论”，因而缺乏理论指导的新现象常被忽略，这最终阻碍了新理论的产生。理论驱动的定量研究特别强调严谨性，这对于检验因果关系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是定量研究范式的严谨性优势也产生了其严谨性劣势（拉金，2019）。因为定量分析和理论驱动的研究强调严谨的演绎，不可避免地产生严谨性与有用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冲突（Guba & Lincoln，1982）。实际上创业中一些重要理论视角的发展过程也并不严谨。在创业研究中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当属最流行的概念，Miller（2011）在回顾 EO 的文献中明确提出，EO 概念发展过程并不严谨，比如涉及多个异质性行业的便利性抽样。Miller（2011）同时指出当前创业研究中的问题：学者们总是倾向于量化研究，而很少走入实践，与企业家好好谈谈。

知识的来源有两类：一是直觉观察，二是对非自己直觉观察的现有知识推导出新知识（Mill，1967 [1843]）。本文认为理论驱动与现象驱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可以结合起来，新的方法论 [如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也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支持。以理论驱动与现象驱动为分类要素，可以把研究分为四类：理论驱动、现象驱动、理论与现象结合，以及弱理论与弱现象。①定量研究更偏向理论驱动的检验，研究者甚至不需要走出办公室就可以基于理论演绎出假设，再基于二手数据分析检验假设。②定性研究者更偏向现象驱动，强调研究者深入现象，在田野扎根和互动活动中得到启发、归纳理论。现象驱动的研究更适合在新现象中建构理论。弱理论和弱现象的研究不是好的实践，学者应尽量避免。③第三类是现象与理论结合的研究，如 Browder 等（2019）对创客空间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创客运动的观察，归纳分析了创客运

动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并与先前的设计思维、社会运动、组织学习等理论对话。李海洋和张燕（2016）也指出将特定情境的实践（如中国）与普适的理论融合可以实现理论创新。不同的研究类型需要不同的方法做支撑。结合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方法可以助力理论驱动与现象驱动结合的研究（Frese, 2005）。QCA方法将定性比较量化，是整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一种方法（拉金，2019），有望为现象驱动和理论驱动结合的组态问题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理想类型与创业组态分析

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发展理论的一种理论模型，是社会家 Weber 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制度逻辑（Thornton et al., 2012）、战略类型（Miles & Snow, 1978）、组态视角（Fiss, 2007）等方面的研究被广泛采用。理想类型将现象进行多维分类，包括两个重要组成：一是定义和描述理想类型。理想类型很少在经验上存在，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经验现象的精确描述，它是将分析现象抽象为逻辑上的纯粹组合。通常它通过进行名称定义而非事实定义（Mill, 1967 [1843]）来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二是发展理想类型与结果变量间的联系，以此提出理论观点（Doty & Glick, 1994）。理想类型刻画因果复杂的现象，通常采用多种维度描述。比如，在制度逻辑理论中，每一种制度逻辑就是反映一种制度秩序的理想类型，是在多种制度要素上、系统地定义制度秩序的边界（Thornton et al., 2012）。Miles 和 Snow（1978, 2003）将战略类型分为探险型、防御型、分析

型和反应型，每种战略类型都是技术、结构和过程的特定组态。探险型战略是变化和不确定产生者，其主张不断地寻求新的产品和市场机会，效率并不是其首要目标。防御型战略聚焦于细分的产品和市场，倡导效率，不对现有的技术、结构和过程做大的调整。分析型战略强调根据环境选择战略，在稳定的领域中，他们诉诸正式化的结构和过程以追求效率。在动荡的环境中，他们密切关注竞争者，从其身上学习有效的创意并快速采纳。反应型战略主要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很少主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Miles 和 Snow（2003）认为采取前三种战略的组织属于稳定的组织类型，即组织采取这三种战略，并采取相应的组织形式，组织是有效的。而采取反应型战略的组织则是不稳定的组织类型，即这类组织不会把握住机会，往往是无效组织。不同理想类型是基于分类要素构成的各种组态（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iss（2011）引入组态视角和 QCA 方法分析了这些战略类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组态视角认为多种要素相互依赖共同决定结果，并将前因要素按照不同组合分为多种组态，在单个要素层面上分析其必要性，在组态层面上分析哪些组态可以充分一致地产生期望结果。组态视角秉持等效性立场，认为多种路径可以产生相同结果（拉金，2019；Fiss, 2007）。组态视角与早期的类型学不完全相同，组态视角关注前因变量间相互依赖并发产生的结果，以及不同变量在不同组态中所起的核心或者边缘作用。而早期的类型学通常并不会区分类型中不同要素间的作用差异，只关注不同部分如何“匹配”构成什么理想类型。因此组态视角聚焦于有复

杂因果机制的研究，而类型学常以产生某些分类为结果（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Fiss，2011）。因此，组态是类型，但不是所有的类型都是组态。这一区分可以避免理论视角与方法不适配的问题，十分重要。如 QCA 方法因为更加符合多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决定结果的组态问题的研究而受到推崇（Fiss，2007）。

创新和创业理论中存在典型的“组合”特征。比如组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新企业战略与创业导向、资源拼凑、商业模式等。首先，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企业家就是将生产要素进行创造性组合的一群人。按照这一概念，要研究创新和企业家则需要研究其背后的“组合”机制。本文认为组态视角提供了深入分析企业家如何组合创新的工具。基于组态视角研究者可以分析哪些要素是创业企业必备的创新要素，哪些要素的组合可以产生高的组织创新。研究者还可以分析哪些要素的共存会对组织创新产生负面的作用。

此外，在创业领域，新企业战略与创业导向（EO）长期被关注，在新企业战略领域，学者们长期使用聚类分析产生战略组态，以弥补传统战略分类宽度的不足（Carter et al.，1994；McDougall & Robinson，1990）。而 EO 学者通常认为 EO 具有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等维度，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这些维度间是否是共变关系存在争议（杜运周等，2008）。虽然研究中将创业导向各维度视为共变，平均其测量指标处理的文章很多，Miller（2011）也认为 EO 测量及其使用是一个问题，提出可能要考虑维度间的差异性，并呼吁采用组态视角而非权变视角分析 EO 在不同情境下，与不同组织、

战略等的匹配问题，及其可能的差异作用。Miller（2011）认为在研究匹配问题上，组态视角优于权变视角。虽然权变视角可以通过引入调节变量解释主效应关系（比如，正 vs. 负）的争论，但是引入调节变量对于解决这种争论远远不够，因为可能影响 EO 与结果变量关系间的调节变量非常多，研究者很难事先确定是什么变量起作用。引入组态视角，事先对组织进行分类，可以有助于分析复杂的情境下 EO 的作用（Miller，2011）。本文认为，引入组态视角可以在两个方面对 EO 研究做出贡献：一是考察不同 EO 维度的组态，更细致地对组织间 EO 分类，更好地诠释 EO 的内涵，细化 EO 与组织绩效的复杂关系；二是分析 EO 与组织、战略和环境的组态，及其与组织结果的关系，可以帮助解决 EO 与绩效关系间长期的争论。这类研究不再简单地回答在什么条件下，EO 与绩效是正或者负的关系，而是可以更加丰富地回答什么环境、什么组织类型、什么战略与什么程度 EO 组合可以产生何种绩效。

对于创业者来说，整合和组合资源一直是其核心的职能，然而如何组合才能带来预期结果？创业拼凑研究提出了即兴组合手头资源，解决创业资源约束的思路（Baker & Nelson，2005）。创业拼凑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手头资源（看似无用或者低廉）、为新目的进行资源组合，以及奏效（行动导向）。创业拼凑的核心思想和内容体现出了组态思维，从结果（新目的）出发寻找解决方案（资源组合）。组态视角分析创业拼凑可以有助于回答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哪些手头资源可以通过哪些组合实现创业新目的？二是不同的手头资源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商业模式是价值发现、价值匹配和价值实现过程中一系列要素的组合,是典型的组合特征的视角。它采取“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视角来解释公司是如何经营的”(Zott & Amit, 2013)。这意味着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影响因素,而不是单一因素。因此应该将其视为类型来分析(Zott & Amit, 2013)或者将其视为组态来研究(Baden Fuller & Mangematin, 2013)。Täuscher (2018)以及Hinings (2018)更是明确提出应该采用QCA来研究商业模式各要素如何匹配决定组织的结果。Täuscher (2018)归纳出商业模式的三种不同解释:公司属性,认知和语言图式,以及组织如何运行的正式表达,并提出商业模式的这些解释都很适合用QCA方法分析的组态问题。本文认为引入组态视角和QCA方法,可以厘清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中,哪些是企业必备的要素,通过哪些组合模式,可以实现组织预期的成长,或者避免负面的结果。

五、组态比较分析与QCA方法

为什么要采用QCA方法?创业领域中,具有组合特征、整体视角、理想类型的问题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但是,由于方法与理论的不适配,以往的创业研究在具有整体论和组态视角的理论发展上进展缓慢。比如商业模式概念发展很快,但是相应的实证进展缓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使用传统的方法不匹配组态商业模式概念(Täuscher, 2018)。比如使用两项或者三项交互回归模型(最多处理三个变量的交互)研究多种要素构成的商业模式,势必要把商业

模式这一整体割裂。在早期研究中,战略学者经常使用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变量的聚类方法来分析组态问题。但是在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中,聚类的产生受研究者影响很大,如由研究者选择聚类变量、决定聚类的数量、选择聚类的算法等。因此“使用聚类分析经常被广泛批评”(Ketchen & Shook, 1996)。同时,聚类分析只是将研究对象在多维空间(多个变量)上根据距离或相似性进行了归类,但是它本身并不分析这些变量间的相互关系(Fiss, 2007)。事实上,聚类分析要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即变量间的相关性必须较弱。这进一步决定了聚类分析不适合研究变量间相互依赖共同决定结果的组态问题。而QCA这一方法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处理多变量组合形成并发原因的因果复杂关系,共线性问题在QCA里不是问题(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因此这一方法非常适合组态问题。QCA是一种定量与定性方法有效结合的方法,它采用整体论,关注定性结果,将研究对象(案例)视为变量构成的组态,开展案例间的系统比较,来发现因果解释。其优势在于分析组态效应(拉金, 2019),非常适合商业模式等问题的研究。

QCA作为一种比较方法,其对因果推理的认识论基础来源于哲学家Mill (1967 [1843])发展的“一致性方法”和“差异性方法”的思想。一致性方法的逻辑是“如果被研究现象的两个或多个实例只有某一个共同情况,那么这个使所有实例都表现出一致性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的原因(或效果)”(里豪克斯和拉金, 2017)。差异性方法的逻辑是如果被研究的现象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均相同,存在某一个不同的

情况使这些现象表现出差异,那么“这个使被调查对象表现出差异的唯一情况,就是这些现象的结果、原因或是原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豪克斯和拉金,2017)。需要说明的是 Mill 的逻辑是纯粹理想化的推理,在真实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充分控制所有其他因素,观察某一要素是否是产生差异或者相同结果的原因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致性和差异性逻辑,让研究者可以更接近找到某个现象的发生原因,在逻辑上推理特定假设比竞争性假设更可信。

根据一致性逻辑,最大化现象的差异、考察相同的结果(最大差异、相同结果方式),可以得出使案例间表现出一致的原因,就是可信的原因。QCA 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最大差异、相同结果的比较方法。这种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必要条件关系和充分条件关系。必要条件关系考察共享结果的案例是否一致的共享条件,在集合理论中,可表示为结果是前因的子集($Y \subset X$),也即如果 X 不出现,就不会产生 Y。充分条件考察共享前因条件(通常是条件组合)是否一致的共享结果,用集合理论表示即前因是结果的子集($X \subset Y$),也即 X 组合出现,就会产生 Y。

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日益成为学者关注的两种因果解释(Fiss, 2011)。前者关注单个条件的约束作用,后者关注条件的组态效应。运用到创业和创新领域可以帮助揭示哪些单一的个体、组织或者环境因素是创新、创业产生预期结果的约束条件,以及哪些要素的组合可以产生创新、创业预期的结果,构成创业企业可行的组合创新、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因此,组态视角与 QCA 方法的结合可以推动组织演化、

资源拼凑、商业模式、创业导向等领域实证研究的发展。

六、结论

Aldrich 的学术经历启发了我们,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既需要具备对理论的敏感性,还要深入实践、洞察现象。Aldrich 教授倾其一生发展的组织演化理论将组织与环境的匹配视为解释创业现象的重要机制。他的文章总结了现象研究在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最新的创客运动现象的研究前景以及创客运动的意义。首先,本文认同 Aldrich 的组织与环境匹配的思想,但也指出这一被动型“匹配”视角忽略了个体主动性的局限,延伸提出引入组态视角,整合组织演化理论和个体主动性视角,研究个体、组织和环境匹配的思路和前景。其次,本文认同现象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将理论驱动与现象驱动结合研究的重要性,并强调这需要整合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论。再次,本文述评了理想类型和组态视角,分析了它们对具有组合特征的创新创业理论(如组合创新、新企业战略和创业导向、资源拼凑、商业模式等)发展的价值。最后,本文提出研究组态问题需要与之匹配的方法论,并介绍了 QCA 方法的内涵,因果推理的逻辑,及其所回答的必要和充分两种复杂因果关系类型。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作者简介：杜运周，博士，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比较方法专家网络 COMPASSS 咨询委员，《外国经济与管理》（东方管理）编委、《管理学报》（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专栏专家委员会委员、《财贸研究》编委、《管理学季刊》领域编辑。主要研究兴趣：QCA 方法、制度与制度逻辑理论、创客空间与创新创业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项。主持翻译出版了 QCA 经典著作：《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联合机械工业出版社等举办了三届 QCA 方法工作坊，以及 2018 年 IACMR QCA 工作坊。曾获“南开十杰”称号、Emerald Citation of Excellence Award 和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

参考文献

[1] [比利时] 伯努瓦·里豪克斯、[美] 查尔斯·拉金：《QCA 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2] [美] 查尔斯·拉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研究：模糊集及超越》，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

[3] 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 年第 6 期。

[4] 杜运周、任兵、陈忠卫、张玉利：《先动性、合法化与中小企业成长——一个中介模型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8 年第 12 期。

[5] 李海洋、张燕：《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有机结合——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管理学季刊》，2016 年第 4 期。

[6] Aldrich, H. E.: 《对我研究生涯和组织与创业领域作品的反思》，《管理学季刊》，2019 年第 4 卷第 3 期。

[7] Aldrich, H. E., & Fiol, C. M. 1994. Fools rush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645-670.

[8] Aldrich, H. E., & Auster, E. R. 1986. Even dwarfs started small: Liabilities of age and size and thei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 Barry M. Staw, & Larry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165-198. Greenwich, CT: JAI Press.

[9] Aldrich, H. E. 2008.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Aldrich, H. E. 2011.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ship*.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1] Aldrich, H. E., & Ruef, M. 2006. *Organizations evolving*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2] Baden-Fuller, C., & Mangematin, V. 2013. Business models: A challenging agenda.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1: 418-427.

[13] Baker, T., &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 329-366.

[14] Browder, R. E., Aldrich, H. E., & Bradley, S. W. 2019. The emergence of the maker movement: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4: 459-476.

[15] Carter, N. M., Stearns, T. M., Reynolds, P. D., & Miller, B. A. 1994. New venture strategies: Theory development with an empirical bas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21-41.

[16] Child, J. 197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 *Soci-*

ology, 6: 1-22.

[17] Doty, D. H., & Glick, W. H. 1994. Typologies as a unique form of theory building: Toward improved understanding and model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230-251.

[18] Fiss, P. C. 2007.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1180-1198.

[19] Fiss, P. C. 2011.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 393-420.

[20] Frese, M. 2005. Grand theories and mid-range theories: Cultural effects on theorizing and the attempt to understand active approaches to work. In K. G. Smith and M. A. Hitt (Eds.),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4-108.

[21] Gartner, W. B. 1988. "Who is an entrepreneur?" is the wrong ques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12: 11-32.

[22] Graebner, M., Knott, A. M., Lieberman, M., Mitchell, W., & Helfat, C. 2018. Question-driven and phenomenon-based empirical strategy research. <https://www.strategicmanagement.net/smj/overview/special-issues/past-special-issues#conferenceTrackAccordionHeading-past-special-issues-question-driven>.

[23]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2.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Journal*, 30: 233-252.

[24] 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346-1352.

[25] Hinings, C. R. 2018. Why should we bother? What are configurations for?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6: 499-509.

[26] Ketchen, D. J. J., & Shook, C. L. 1996. The application of cluster analysi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441-458.

[27] McDougall, P., & Robinson Jr, R. B., 1990. New venture strategies: An empirical identification of eight "archetypes" of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en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 447-467.

[28] Miles, R. E., & Snow, C. C. 1978.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D. Meyer; H. J. Coleman Jr., Contributor. New York: McGraw Hill.

[29] Miles, R. E., & Snow, C. C. 2003.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D. Meyer; H. J. Coleman Jr., Contributor. Stanford, CA: Stanford Business Classics.

[30] Mill, J. S. 1967 [1843].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1] Miller, D. 1983.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 *Management Science*, 29: 770-792.

[32] Miller, D. 1986. Configurations of strategy and structure: Towards a synthe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 233-249.

[33] Miller, D. 1996. Configurations revisite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7: 505-512.

[34] Miller, D. 2011. Miller (1983) revisited: A reflection on EO research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 873-894.

[35] Ployhart, R. E., & Bartunek, J. M. 2019. Editors' comments: There is nothing so theoretical as good practice—A call for phenomenal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4: 493-497.

[36] Stinchcombe, A. L. 1965.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44: 142–193.

[37] Täuscher, K. 2018.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ystem dynamics for theory-driven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6: 470–481.

[38] Thornton, P. H., Ocasio, W., &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39] Wiklund, J., & Shepherd, D. 2005.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small business performance: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 71–91.

[40] Zott, C., & Amit, R. 2013. The business model: A theoretically anchored robust construct for strategic analysis. *Strategic Organization*, 11: 403–411.